

# 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基本经验

刘 儒,李超阳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49)

**摘要:**收入分配政策是影响人民生活最基本的政策。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们党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推进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和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最终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全体人民日渐共同富裕。以新中国承袭而来的落后的旧经济体为现实逻辑起点,探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政策曲折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以及所形成的丰富而鲜活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新时代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政策、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践行共享发展新理念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政策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20)04-032-14

## 一、引言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sup>[1]</sup>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思考和处理收入分配问题。经过 70 多年艰辛探索,我国最终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sup>[2]</sup>,实现了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结合,按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兼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70 多年来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创新,一方面,增强了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使整个微观经济充满生机活力,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历史性地提高了人民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49 年的 49.7 元<sup>[3]</sup>攀升至 2019 年的 30733 元<sup>[4]</sup>。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诸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劳动者收入增长较慢、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也阻滞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因此,面对新时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深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探索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突出问题的

收稿日期:2020-03-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KS008)

作者简介:刘儒(1959-),男,陕西白水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收入分配研究;李超阳(1992-),女,山西岢岚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收入分配研究。

政策措施,就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亟待深化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文献梳理发现,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政策演变的历程<sup>[5-6]</sup>、演变的取向<sup>[7-8]</sup>、演变的动力<sup>[6][9-10]</sup>,以及收入分配政策效应<sup>[11-13]</sup>等四个方面,现有研究很好地推动了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研究的深化。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进一步梳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政策变迁的历史脉络,探寻其创新前行进程中的基本经验,以期为新时代“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提供镜鉴。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进路

新中国 70 多年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历程,以新中国承袭而来的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两极分化的旧中国经济体为现实逻辑起点,内生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共享发展理念,历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大时代,其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 1. 以集中化、低水平和平均化为特点的政策初创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面临一系列严重问题和资源匮乏,通货膨胀蔓延,威胁着工业现代化和增加农业生产的压力。城市劳动力大批失业。工厂已在战争期间倒闭,对外贸易锐减并已实际上受到封锁。”<sup>[14]290</sup>国民经济整体凋敝萧条。在收入分配领域,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两极分化鸿沟巨大,基尼系数高达 0.558。<sup>[15]</sup>广大劳动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但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在如此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背景之下,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气魄,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和国民经济,并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底,我国基本上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建立起包括按劳分配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巨变,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50 年代,共产党重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个在国际关系中享有充分主权的国家,一个有利于经济复兴与发展的稳定而统一的制度。”<sup>[14]290</sup>

按劳分配制度的确立,实现了“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sup>[16]126,127</sup>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奠定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国实施和完善了一系列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为中心的收入分配政策,党的八大又提出要破解“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这就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两方面形成持续的激励,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推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生产力空前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 1949 年的 358 亿元增长到 1957 年的 1069.3 亿元,年均增长 14.66%,居民人均收入从 1949 年的 66.1 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168 元,年均增长 12.37%,<sup>[17][18]6-9</sup>实现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事实表明,按劳分配原则及其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本身兼具效率和公平,并不必然导致低收入水平和平均主义。

然而,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囿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的局限,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实践中开始与效率和公平渐行渐远。一方面,基于对国内经济社会状况和国际环境的理解和判断,我们党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国家战略,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基础长期薄弱、轻工业几近阙如、市场发育严重不足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其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为此,就必然要求采取一系列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经济政策,以使政府能有效控制生产剩余,保证稀缺生产要素以超低价格配置到重工业领域。就收入分

配政策而言,则不得不在“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sup>[19]</sup>的要求下作出相应调整。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度增长是在人均的低水平上起步的。中国以人民生活和资源为代价,直到7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虽不平衡但却很高的增长率。”<sup>[14]310</sup>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国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的历史课题。为此,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sup>[20]</sup>但是,毕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深、经验不足,在艰辛实践探索中难免出现失误和偏差,再加上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存在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倾向,偏离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及其确定的中心任务。这就导致按劳分配制度及其收入分配政策得不到科学、有效贯彻,并逐渐演化为以集中化、低水平和平均化为特点的收入分配政策。

在农村,从1953年起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等文件,取缔了原有农产品自由交易市场,实行国家统一收购、统一供应,这就使国家自然获得了对农民“钱袋子”的直接控制权。但在实施过程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以农促工措施受到农民抵制,为保证工业化发展所需资金的充足供给,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迅速推进。到1957年末,全国高级社达75.3万个,入社农户比例达96%以上。<sup>[21]</sup>由此,集体经营体制近乎完全取代了家庭个体经营体制,社员按工分取酬。在这种缺乏有效激励的经营体制下劳动者生产疲惫造成的低效率已经使农业增长受挫,再加上补给工业发展的扣除,农业生产者最终收入越发微薄。据统计,1952~1978年,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积累资金达51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三分之一;<sup>[22]</sup>1957~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2.3%。<sup>[3]</sup>

在城市,随着私营部门的消除,绝大多数从业者转为国营企事业单位或集体企业职工,其工资与国家行政人员一道完全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制的分配体系中。1956年《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规定,从业人员按等级获得工资,无论是等级工资标准还是职工等级升迁,都由行政机构决定,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城市职工收入的干预管控。在当时社会剩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职工工资处于相对较低水平。1957~1978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货币工资最高仅为661元,城镇集体单位为571元(如图1所示)。另外,统计数据显示,195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4元,到1978年增长至343元,年均实际增长0.8%。<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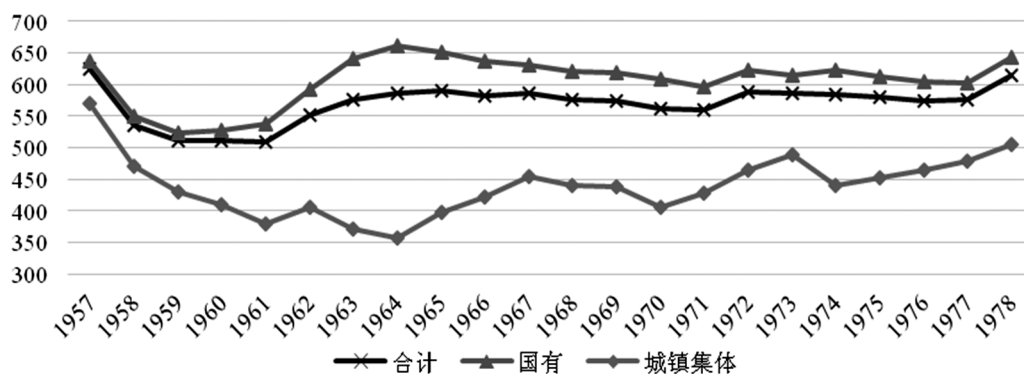


图1 1957~1978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单位:元)

注: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纵观这一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发展演变,应该说其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建立了按劳分配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政策,从物质利益上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了分配领域的历史性革命;其次,收入分配政策通过激励生产组织和生产者发挥了分配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最后,收入分配政策最直接的效应和功绩,就是在经济增长与发展基础上维持了全国数亿人口的基本收入和基本生活,并保证其缓慢提高。然而,这一时期分配政策的弊端也同样是明显和严重的。首先,收入分配领域逐渐出现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最终演变为“大锅饭”模式。按劳分配制度及其收入分配政策本身并不导致平均主义,形成这一时期严重平均主义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一是“国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sup>[23]</sup>二是“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党内就出现将按劳分配原则及差别工资制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倾向,甚至提出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尽管195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强调人民公社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但对能够带给农民“更幸福的集体生活”的供给制也加以了肯定。<sup>[24]</sup>同年公布的《关于企业实行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制的初步意见(草案)》更是规定在一些地方试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收入分配领域的平均化倾向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前夕,严重弱化和扭曲了激励机制,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生产积极性,致使经济运行效率下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受限(如图2所示)。其次,在收入分配整体上呈现平均化趋势的同时,城乡之间的分配差距却较为突出。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约为2.57。<sup>[18]25</sup>而且,实物供给的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其实际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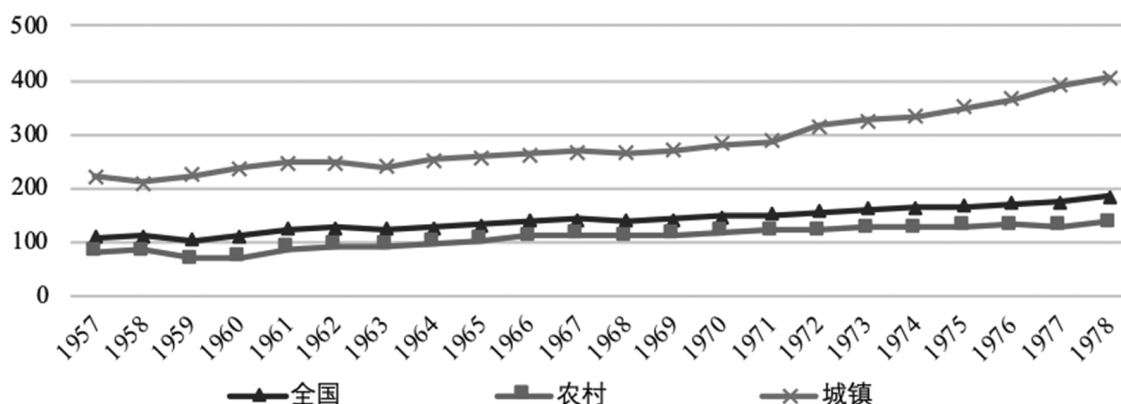


图2 1957~1978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单位:元)

注: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 2. 以帕累托改进为目标的政策调整阶段(1978~1991年)

面对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益明显的经济颓势,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已难以为继,中国社会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与革命。在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还不可能马上变革的现实面前,理论和政策首先在科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革除平均主义弊害等方面寻求突破。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sup>[25]30,31</sup>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邓小平审阅过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彻底否定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产生基础的“左”的论调,明确提出

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真正的革命发生在1978年5月5日——因为就在这一天,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被重新确定。”<sup>[26]</sup>邓小平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一文中针对当时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指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sup>[25]101</sup>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波浪式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sup>[25]152</sup>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要求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在生产迅速发展基础上显著改善城乡人民生活。<sup>[27]7</sup>我国以帕累托改进为目标的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应势铺开。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路径一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也首先从农村地区展开。其实,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sup>[28]</sup>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允许实行包工到组,在生产队统一经营与核算下按产量计酬。<sup>[27]162</sup>但此时,“分田单干”仍是明令禁止的,实际存在的“劳一酬”脱节分配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直到1980年,多种经营形式、多种计酬办法被允许同时存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才得以解冻。<sup>[27]474,475</sup>1982年1月1日,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更为明确地指出:“联产就需要承包。”<sup>[29]</sup>此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经营方式迅速在全国推广。到1982年末,全国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双包”,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至此,广大农民的收入与劳动贡献直接挂钩,“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中国农民第一次获得了经济“剩余索取权”。农业经营体制和分配方式的转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亿吨,<sup>[30]</sup>显著改善和提高了农民生活。其中,承包责任制对1978~1984年农村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46.89%,占各项农村改革贡献率总和的96.4%。<sup>[31]</sup>

农村地区政策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决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sup>[32]</sup>。《决定》要求在城市地区推行以承包为主的经济责任制,赋予企业决定职工工资和奖金的自主权。1985年1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sup>[33]</sup>这些政策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推行得到比较好的贯彻和实施,明显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生活水平。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概括了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收入分配政策:“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sup>[34]28</sup>针对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会议再次强调指出,“当前分配中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sup>[34]28</sup>为了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和提升经济效率,此次会议首次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对债券利息、股份分红、经营风险补偿金等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予以肯定。<sup>[34]28</sup>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个人收入的来源渠道,为后来实行的按要素分配进行了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

可见,这一时期收入分配政策关注的焦点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分配领域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二是克服过分强调国家集体利益而忽视微观主体利益的倾向,促进人民生活状况改善;三是逐

步推行多种分配方式,促进收入分配与市场机制结合,消解长期存在的效率抑制效应,坚持效率优先目标。事实证明,一系列消解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使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得以释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据统计,1978~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78.7亿元攀升至22050.3亿元,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加4倍左右,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6.4%与14.9%(如图3所示)。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回落,尤其是1978~1985年,其差异倍数持续走低,由2.57降至1.86(如图4所示)。收入分配状况总体持续趋向帕累托改进。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地区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非公经济的日渐成长以及体制转换过程中引致的价格双轨制的存在,居民收入差距开始进入上升渠道,据统计,1985~1992年,我国基尼系数提高了约9%,<sup>[13]</sup>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逐渐突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sup>[35]110,1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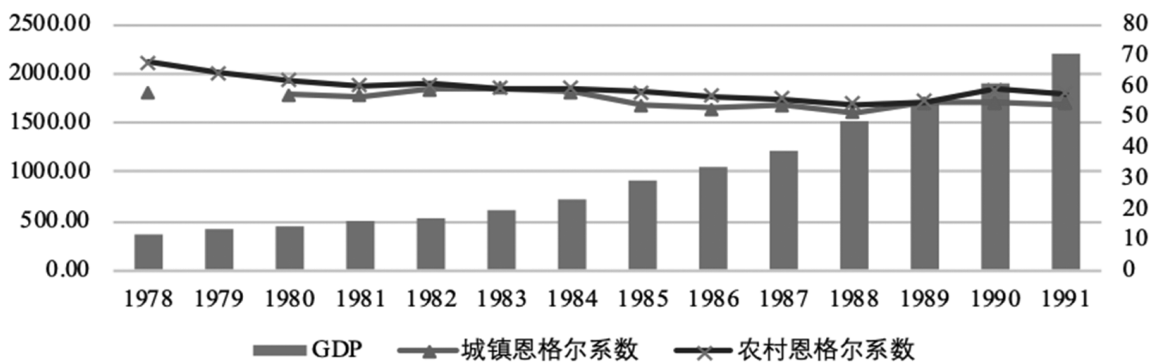


图3 1978~1991年GDP与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单位:十亿元/%)

注: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恩格尔系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其中1979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数据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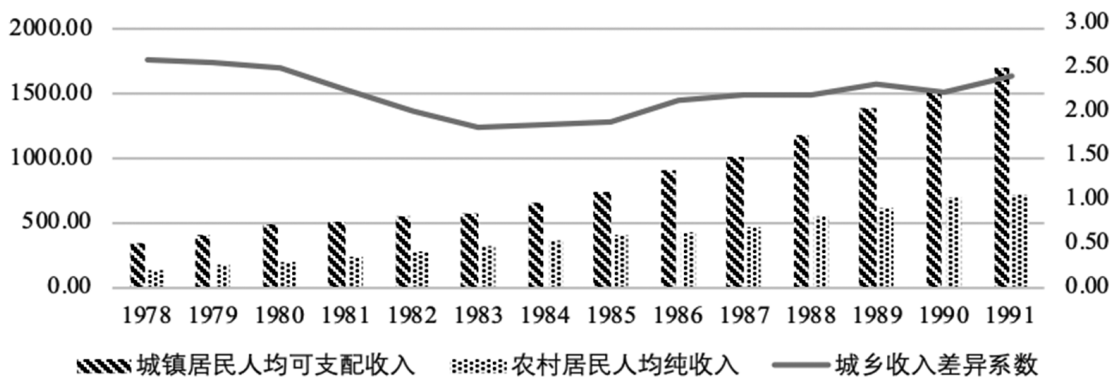


图4 1978~199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状况(单位:元/倍)

注: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 3.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旨的政策更续阶段(1992~2011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拨正我国市场化改革航向,破除了长久以来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突出强调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同年,党的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sup>[36]17</sup>显然,收入分配政策开始由“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向“兼顾效率与公平”悄然转变。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面

临两大任务,一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创新、实施“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由此引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开始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一系列创新性演变。

党的十四大以后,一方面,随着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日益凸显,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在实践中突破了以往“主体—补充”框架,转向“主体—并存”模式,参与分配的要素逐渐多元化。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并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sup>[36]</sup><sup>465</sup>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明确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sup>[37]</sup>随着要素市场的发育壮大,十六大扩充了可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将管理纳入其中,并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方式加以明确。<sup>[38]</sup><sup>12,21</sup>十七大重申十六大的政策主张,并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sup>[39]</sup><sup>30</sup>这一系列政策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并强化了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的合法地位,促进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据统计,1995~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年增长率为7.5%,其他各类收入年增长率均高于11%;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年增长率高达23.3%,其余各类收入年增长率均在9%以上<sup>[40]</sup>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政策取向持续优化,不仅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诉求,更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平关照。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1世纪初,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全球120个国家与地区中居第36位。<sup>[41]</sup>面对居民收入差距,继十四大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之后,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sup>[38]</sup><sup>121</sup>。十七大又进一步将公平问题延伸至初次分配领域,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sup>[39]</sup><sup>30</sup>,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由板块式结合向有机结合的转变。另外,为了有效遏止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趋势,再分配政策相继出台并逐渐完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保障制度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五大环节之一,先后建立了社会化的职工工伤、生育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十六大之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更是进入城乡统筹、全民覆盖、全面发展时期,力求多层次、宽领域地为城乡居民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居民家庭,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于关键阶段,坚定了市场化改革方向,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收入分配政策在市场化演进中孕育出重大创新:一是进一步实现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结合,促进分配机制市场化;探索实现按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兼容,引致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经济建设与社会财富创造。二是逐步实现由更加关注效率到更加关注公平的转变,推动收入分配格局持续优化。收入分配政策的市场化演进及其创新使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激励效应充分显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显著提高。1992~2011年,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通道,增长率有一半时期处于10%以上的高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也分别达到8.2%和6.2%(如图5所示),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然而,也应看到,这一时期改革发展的红利并未充分惠及全体人民,收入分配非均衡状况不断积累并逐渐凸显。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于1994年冲破国际警戒线之后一直居高不下,而且相较其他国家,2011年我国的分配不均等程度也较为突出(如图6所示)。另外,劳资分配也呈现出逐渐失衡的态势,劳动报酬占比总体呈缓慢下滑之势,由1990年的53.4%降至2011年的44.9%,而同期营业盈余占比则由21.85%上升至26.53%。<sup>[42]</sup>导致收入分配非平衡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市场的原生性失灵。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下,经济行为主体因拥有的要素禀赋与数量殊异,必然获得差异性的要素收入。二是资强劳弱的凸显。市场化分配制度强化了劳动者在劳资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三是再分配政策的逆向调节效应。我国社会保障因制度不健全、水平较低等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村和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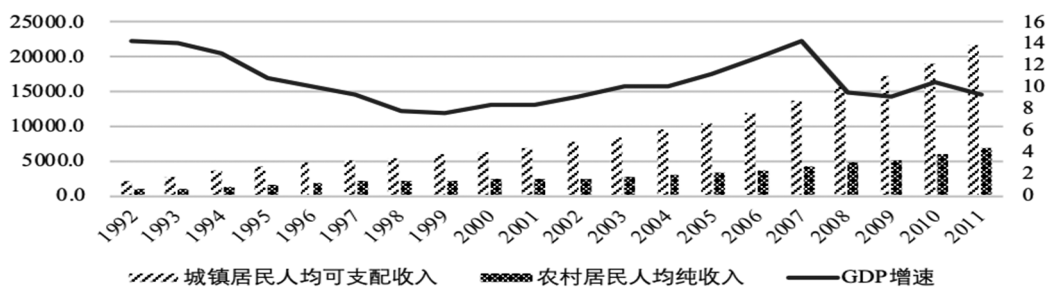


图5 1992~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GDP增速变化情况(单位:元/%)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47,3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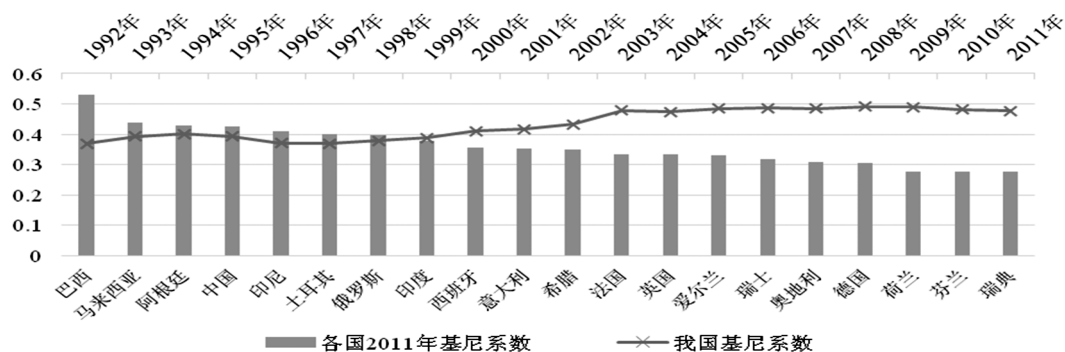


图6 1992~2011年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及2011年基尼系数国别比较

注:各国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我国1992~2002年数据来源于《The Trend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China》,《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0年第1期;我国2003~2011年数据来源于《统计局首次发布十年基尼系数略高于世行计算的数据》,《人民日报》2013年1月19日第4版

#### 4. 以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核心的政策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我国进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sup>[43]25</sup>但从实际看,步入新时代,虽然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得到了初步抑制,但是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比较大。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一就是发展不平衡,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sup>[44]12</sup>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共享”提升至新发展理念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45]</sup>这里的“不平衡”所包含的多方面含义当中就包括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正如报告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sup>[45]</sup>显然,在由“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成为我们党收入分配政策显著的重要任务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入分配政策首先聚焦于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第一,继续巩固按劳分配主体地位。按劳分配是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分配公平的根本保障与有效途径。针对劳动报酬份额持续走低问题,党的十八大重申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收入分配政策。<sup>[44]28</sup>随后,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从创造平等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技能、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收入分配政策的具体实现路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sup>[46]</sup>第二,深



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机制。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对于促进社会财富涌流、做大“经济蛋糕”有积极推动效应,更是经济行为主体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拓宽可参与分配的要素范围,首次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其中,并作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深刻定位,更加突显出市场的支配性和主导性特征,由此将市场机制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推向深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sup>[47]</sup>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刻变革与广泛渗透,数据成为生产经营活动不可或缺的新生产要素。十九届四中全会积极适应这一现代经济发展的新态势,首次将“数据”增列为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sup>[46]</sup>进一步激发经济行为主体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同时,收入分配政策努力促进分配均衡,保障分配公平。第一,规范分配秩序。党的十八大在党的十七大的基础上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sup>[44]</sup><sup>28</sup>随后党和政府出台一系列整顿分配秩序的具体政策,例如,2014年对长期存在的央企、国企高管畸高薪资明确设置上限。第二,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sup>[44]</sup><sup>28</sup>之后,《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从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促进教育公平力度、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另外,精准扶贫脱贫政策也是我国推进减贫事业、缩小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为了提升扶贫效率,啃下深度贫困这块“硬骨头”,党中央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之后相继发布4个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推进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截至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5年的5.7%。<sup>[48]</sup>在此基础上,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更是专门制定了2020年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宏伟目标,并提出产业帮扶、易地搬迁等十余项具体实施方略。<sup>[49]</sup>

随着一系列促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社会公平进一步加强,人民福祉进一步增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收官阶段,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充分彰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凸显。统计数据显示,2014~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始终保持在6%以上,基本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如图7所示)。收入分配失衡状况得到一定缓解,基尼系数尽管在2017年出现小幅升高,但2012年起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劳动报酬份额小幅回升,由2012年的47.66%增至2017年的51.75%(如图8所示)。减贫成效显著,2012~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348万人,7年累计减贫幅度达到94.4%,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0.6%。<sup>[50]</sup>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对我国这一“史无前例的减贫速度和规模”予以高度评价。<sup>[5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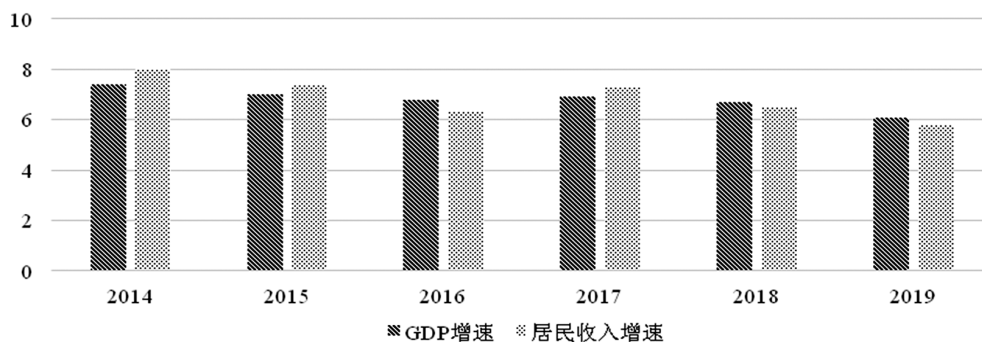


图7 2014~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单位:%)

注:2014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2019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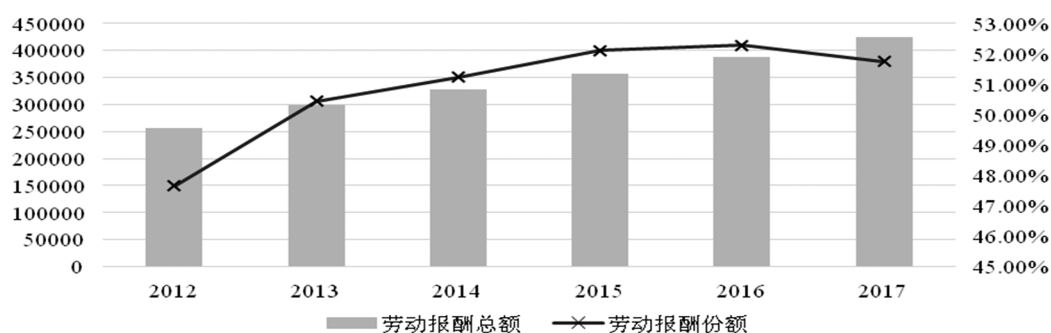


图8 2012~2017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额与劳动报酬份额(单位:亿元/%)

注:数据来源于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在一个历经战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两极分化的国度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这一进程当中,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不断变革和完善,最终形成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政策也同样波澜壮阔。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始终循着目标引领、问题导向的演进逻辑,积累了丰富而鲜活的历史经验。

#### 1. 坚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建构基础上,前瞻性地构设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sup>[16]787</sup>，“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sup>[52]308</sup>。因此,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开始就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初心使命。早在1953年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就指出:“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sup>[53]</sup>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个社会要实现惠及所有民众的普遍富裕,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大幅增加人民收入。如果社会生产力不发展,“那就只有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sup>[52]166</sup>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规律驱使下也竭力追求社会财富增长与丰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52]405</sup>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却没有实现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兼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陷入两极分化深渊的历史必然性。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生产目的必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sup>[54]</sup>。因此,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非无差别富裕。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这种公平是就分配过程而言的,并非是指分配结果的完全均等化。改革开放前30年的平均化分配格局尽管有其客观必然性,但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sup>[35]155</sup>同时,共同富裕也并非同步富裕。面对改革开放之前长期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

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我们党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波浪式达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正如邓小平所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sup>[35]172</sup>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收入分配政策逐步“放权让利”,赋予劳动者正向、直接的物质激励,允许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开始以效率优先为政策取向,渐次允许资本、技术、管理、知识、土地、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激发要素活力,促进财富充分涌流,实现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大幅度跃升。面对日渐凸显的收入差距,分配政策的重心又更加强调公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为核心的收入分配政策成效日显,推动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

## 2. 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分配辩证关系基本原理

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两者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sup>[16]695</sup> 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成后,消灭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分配制度,确立了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单一按劳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启与渐进式深入,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演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量非公经济成分的涌现要求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与调整,即体现为由“单一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演进过程。可见,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改革完善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渐次演进的根本逻辑。“分配关系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表现形式。”<sup>[55]</sup>

但同时也应看到,“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于经济的事实。”<sup>[16]696</sup> 就我国70多年发展历程看,如前所述,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中国,建立在落后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高就业低收入分配政策在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改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等方面功不可没。但是,长期推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扭曲了激励机制,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迟滞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率先推进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充分发挥分配的经济杠杆作用,用适应于生产关系的分配政策撬动生产力发展,助力国民经济走上历史快车道,实现了经济快速平稳发展。

## 3. 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协同作用

资源的稀缺性使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冲突性。“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sup>[56]</sup> 我国70多年发展实践证明,实现效率与公平协调与均衡离不开市场与政府这两种机制的协同作用,在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要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灯塔”或“守夜人”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以促进公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sup>[44]513</sup>,实现市场与政府的优势互补,无疑是收入分配政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经验。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sup>[43]52</sup> 市场的阙如,必然造成效率的巨大损失,这是新中国70多年发展最深刻的经验教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的缺失使政府难以掌握真实有效的经济活动信息,进而导致供求关系失衡;行政权力统摄下的集中化分配又限制了劳动者获得其劳动剩余的权利,长期实行的基本固化的等级工资制和工分制严重弱化了其应有的激励作用,极大地削弱了经济行为主体的能动性,耗损了经济效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市场机制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整体上呈扩大态势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实践再次证明:市场机制在促进效率的同时难以充分实

现收入分配公平。“由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具有双重功效的价格机制、边际报酬递增的规模效应以及资本的逐利和增殖本性”，市场机制内生地阻碍收入分配公平。<sup>[57]</sup>

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市场失灵，政府必须通过实施再分配政策以实现分配公平与共享发展。戈登·图洛克(Tullock G.)甚至认为，“政府成立的最初动机极有可能就是为了进行某种再分配。”<sup>[58]</sup>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对我们这样一个体制转轨国家而言，发轫于改革开放的市场尚处于发育和成长之中，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生产要素的梯度流动，导致经济发展红利未能获得充分共享。因此，政府还必须通过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秩序以优化分配格局，进而推动财富之水向社会各阶层充分涓滴。实践也充分证明，在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规范分配秩序的收入分配政策实施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确有收敛之势。

#### 4. 积极探索立足发展实践的变革创新

“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sup>[59]</sup>只有实事求是、符合具体国情的政策举措，才能应对实际问题，顺应人民需要，实现既定政策目标。正是由于70多年来收入分配政策立足具体国情不断探索创新，我国才打造出一系列优化分配关系的中国方案。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深、经验不足，实施的集中化、低水平和平均化分配政策所导致的激励抑制和经济低效率，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明显迟滞了共同富裕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汲取历史教训，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下，积极探索和推进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和创新收入分配政策。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有益成分，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生产要素按由市场评价的贡献参与分配的方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制度。“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sup>[60]</sup>

回眸历史可以发现，新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迁基本上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相应地变革政策，变革之后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又衍生出新的问题，进而推动政策螺旋式地纵深发展。在政策初创阶段，集中化、低水平和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政策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居民收入微薄，由此促使分配政策向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提升居民收入转变；经过以帕累托改进为目的的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后，又逐渐引致分配秩序混乱、社会不满情绪滋生，进而推动分配政策实现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并轨与融合；而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旨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又导致收入分配失衡、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凸显，这就使缩小分配差距、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成为下一阶段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核心任务。

## 四、结 语

综览70多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尽管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不同时代，收入分配政策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着力的侧重点也存在明显差别，但都始终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标。无论是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高就业低收入分配政策，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都体现了我们党逐渐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艰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过程。“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sup>[61]</sup>经过70多年的艰辛探索，最终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和一整套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收入分配政策。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即将全面建成惠

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呈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17.
- [2]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 人民日报,2015-11-25(001).
- [3] 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EB/OL]. (2019-08-09)[2019-12-05] 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9\\_1690098.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9_1690098.html).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0-02-28)[2020-02-28] 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 [5] 杨红云. 90年来中国共产党收入分配政策演进的基本规律[J]. 成都:理论与改革,2011(6):71-75.
- [6] 武力.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J]. 北京:教学与研究,2017(8):6-12.
- [7] 郭威,王声啸,张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平观与效率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成都:经济学家,2018(10):32-38.
- [8] 洪银兴.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40年[J]. 北京:经济学动态,2018(4):19-27.
- [9] 邱卫东,高海波. 新中国70年来的共富实践:历程、经验和启示[J]. 银川:宁夏社会科学,2019(2):5-11.
- [10] 王赞新. 我国70年收入分配制度发展的历史进路与理论逻辑[J]. 长沙:湖湘论坛,2019(3):80-88.
- [11] 陈宗胜,高玉伟. 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及橄榄形格局的实现条件[J]. 成都:经济学家,2015(1):30-41.
- [12] 刘伟,蔡志洲. 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北京:经济研究,2017(8):4-16.
- [13] 李实.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十年[J]. 北京:China Economist,2018(4):2-33.
- [14]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15] 胡鞍钢,王洪川. 中国人发展奇迹(1950-2030)[J]. 北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148-157.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 郑有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16.
- [18]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 [1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98.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57.
- [2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农业[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110.
- [22] 许经勇. 农业比较利益偏低新论[J]. 长春:经济纵横,1993(5):1-6.
- [23] 斯大林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05.
- [2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84-387.
-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6] 刘贯学,刘军. 按劳分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讲起[J]. 北京:劳动保障通讯,1999(10):12-14.
- [2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1.
- [28]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 [2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1:365.
- [30] 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EB/OL]. (2019-08-05)[2019-12-05] 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5\\_1689117.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5_1689117.html).
- [31]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95.
- [32]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56.
- [33] 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EB/OL]. (2012-11-23)[2019-12-05] 国务院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2-11/23/content\\_7535.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2-11/23/content_7535.htm).
- [34]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6]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7]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1.
- [3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39]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40] 中国统计年鉴 201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346-364.
- [41]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M]. New York: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8, 259.
- [42] 李晓宁. 以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解读中国劳资分配失衡[J]. 西安:人文杂志,2016(8):28-36.
- [4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4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4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001).
- [46]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001).
- [4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15-11-04(001).
- [48] 李涛,陶明浩,张竞. 精准扶贫中的人民获得感:基于广西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J]. 新乡:管理学刊,2019(1):8-19.
- [4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5-12-08(001).
- [50] 方晓丹. 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EB/OL]. (2020-01-23)[2020-01-23]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1/t20200123\\_1724700.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1/t20200123_1724700.html).
- [51] 世行《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推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EB/OL]. (2018-02-26)[2019-12-05]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http://ie.cass.cn/academics/economic\\_trends/201802/t20180226\\_3857305.html](http://ie.cass.cn/academics/economic_trends/201802/t20180226_3857305.html).
-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69,570.
-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0.
-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91.
- [56] 阿瑟·奥肯. 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M]. 王奔洲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
- [57] 刘儒,李超阳. 市场机制的收入分配效应与政府干预——基于对涓滴效应的考察[J]. 南京:学海,2019(3):154-161.
- [58] 戈登·图洛克. 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M]. 范飞,刘琨,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
- [59]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 人民日报,2017-07-28(001).
- [6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4.
- [6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5.

责任编辑:孙立冰

##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 刘 儒



刘儒(1959-),男,陕西白水人,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入选陕西省“三秦学者”,“汉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现兼任教育部政治经济学博士

论文评审(库)专家,陕西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刘儒教授主要从事《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 20 余项;出版《国际金融危机演变背景下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再研究》《乡村善治之路》《怎样做好新时代支部工作》《百年党的文化建设》著作 4 部;编撰《当代资本主义专题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前沿案例》《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论》教材 4 部。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宝钢优秀教师、王宽城育才奖等。

近年来,刘儒教授在《红旗文稿》《当代经济科学》《财经问题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发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逻辑》《诠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三个维度》《着力补齐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弱项》等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被《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影响力评价·2019》评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十篇学术论文之一。

刘儒教授的主要学术观点有: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创新的学科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分析问题和指导实践;诠释和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关键议题,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艰辛探索的理论结晶,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理论遵循。

##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Outline of Critique of National Economics

### –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Engels' Birth

Yu bin

Abstract: Engels' Outline of Critique of National Economics was praised by Marx as a genius outline in the category of critical economics. In this Outline, Engels' critique of the prevailing economics theories at that time still seems to be quite profound in some ways even today. Some of the main ideas that are still being promoted by Western economics today were criticized by this genius Outline as early as 100 years ago. Although this Outline mainly focused on economics, it was an early classic work with Marxist integrity, because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Marxism were all involved in this genius Outline. This Outline made forward-looking critique of private ownership and genius analysis of competition, which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is day. Of course, this Outline also had it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its flaws could not be concealed, but its flaws were corrected by Marx's Das Kapital.

## Labor Process and Critiqu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 – Concurrent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Engels' Method Contribution on Das Kapital

Xu Guangwei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forming forces of the theoretical categor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mainly come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social labor process,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mage balance centered on "order". Through the critique of "fetishism consciousnes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egory of "simulated market" was disintegrated, and the class struggle was transformed into events and placed in the civilization planning of the labor process. This shows that, based on a survey of general history, the "fetishism theory" and "critique of the labor process" in Das Kapital are synchronous, with the purpose of seeking "liberation of mankind" and "liberation of ownership". Accordingly, the commodity chapt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can be said to echo each other in writing. Engels' interpretation of Das Kapital in terms of historical path helps form the working clue of "labor process combined": the first chapter of Das Kapital introduces the "dialectical path" to reveal that the "objective content" of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quality-quantity-form-law is the historical organic growth of contradictory regulations and forms of ownership.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Marxist law of valu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process constitutes "content dialectics" and the economic form movement constitutes the "form dialectics". The interrelation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economic forms are the basic rules inherent in the natural historical process.

##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iu Ru, Li Chaoyang

Abstrac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policy affecting people's life. For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ur party has take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a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and purpose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reform in the field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djustmen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and finally formed a basic socialist distribution system in which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is dominant and a variety of modes of distribution coexist, and corresponding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healthily,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 well-off society that benefits all people is about to be fully built, and all peopl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We take the backward and old economies inherited from New China as a realistic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complex and magnificent historical chang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s well as the rich and vivid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med, which can bring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in the new era, resolving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new era, and practicing the new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 A New Perspective of Marx's Economic Theory in MEGA – Marx's Original Six-sector Model

Kenji Mori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ies, Marx's reproduction theory is widely known for its "two-sector model". However, research on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s shows that Marx's multi-sector analysis included not only the "two-sector model", but also the "six-sector model", which was completely ignored by Engels when editing volume 2 of the manuscript of Das Kapital.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theoretical segments in the "six-sector" model that were neglected by Engels and explanation of Marx's views o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between production prices and the two equilibrium states are of certain theoretical benefits for understanding Marx's re-production theory.